

文化翻译理论下《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翻译 ——以杨、霍译本为例

王亚帆

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0日

摘要

在全球化文化互鉴背景下,《红楼梦》服饰描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等级及人物塑造等丰富内涵。本文以杨宪益,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立足文化翻译理论,从文化意象传递性、接受语境适应性、翻译策略阐释性三个核心维度,对译本中的服饰文化翻译案例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杨宪益通过直译加注、意译重构、文化对等词替换等策略,在保留源语服饰文化内核与适配目标语读者认知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既传递了清代服饰的文化符号意义,又完成了文化意象的跨语际再生,为中华服饰文化乃至古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文化翻译,《红楼梦》,服饰文化

The Translation of Clothing Culture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Taking the Yang and Hawkes Versions as Examples

Yafan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2, 2026; published: April 10,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the descriptions of clothing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ear rich connotations such as hierarchy and character portrayal. Taking Yang Xianyi's English vers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Hawkes' vers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lothing culture translation cases in the version from three cor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the transmissibility of cultural images,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receiving context, and the interpretability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notes, free transl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equivalent replacement, Yang Xianyi has achieved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retaining the cultural cor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clothing and adapting to the cognitive needs of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He not only conveys the cultural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Qing Dynasty clothing, but also completes the cross-linguistic regener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lothing culture and even classical literature.

Key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lothing Cul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化浪潮推动文化互鉴的今天，中华文化传播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成为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命题。《红楼梦》[1]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其服饰描写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沈炜艳, 2011)。服饰描写不仅是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暗含了制度的严格。例如，贾宝玉的“大红猩猩毡斗篷”象征其贵族身份与叛逆性格，林黛玉的“月白绣花小袄”则映射其清冷孤傲的气质。这些服饰描写不仅服务于人物塑造，更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

但是翻译活动受多种因素制约，译者在传递服饰文化语言时易导致文化缺失或错位。本研究以杨宪益[2]，霍克思[3]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立足文化翻译理论的重重维度——文化意象的传递性、接受语境的适应性、翻译策略的阐释性，进行服饰文化翻译，揭示在文化传统服饰翻译在传递与语言转换间的平衡逻辑，探索中华服饰文化“走出去”的翻译路径，推动文化传播。

1.2. 研究现状

《红楼梦》作为文化典籍，其服饰、器物、礼仪等文化专有项的英译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点议题。在服饰文化负载词方面，季学源[4]系统梳理《红楼梦》服饰的形制、纹样、色彩与礼制内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本与文化依据。缪丽伟[5]以和合翻译理论为框架，考察传统服饰文本的翻译路径，侧重文化内涵的整体性传递。张慧琴、徐珺[6]从文化传播视角探讨服饰翻译的策略选择，指出译者需在文化传真与读者接受之间寻求平衡，相关结论被后续研究广泛引用。

在文化负载词与译本比较领域，现有成果多围绕杨宪益译本与霍克思译本展开。多数研究认为，杨宪益译本更倾向于异化策略，注重保留中国文化特质与原文形式，常以直译、音译加注等方式传递文化信息；霍克思译本则更偏向归化策略，优先考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文本流畅度，对复杂文化信息多做简化或重构处理。相关语料库研究显示，两译本在服饰词汇、句式结构与文化信息处理上存在明显

差异, 杨译更贴近原文形式, 霍译更注重目标语表达习惯。以霍克思为代表的译本实践, 强调目标语文化语境下的意义传达与审美再现, 其处理方式成为海外传播与接受研究的重要对象。文化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等为服饰文化翻译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巴斯奈特、勒菲弗尔提出“以文化为翻译基本单位”, 强调文化功能对等与译者的文化中介角色;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则为服饰色彩、材质、纹样等文化意象的等效传递提供了可操作的评价维度。这些理论共同推动了研究重心从单纯语言转换转向文化传递效果与跨文化接受。

基于此, 本文以文化翻译理论为框架, 将杨宪益译本与霍克思译本作为平行语料, 聚焦服饰文化翻译展开对比分析, 以期对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文化翻译理论与《红楼梦》服饰文化

2.1. 文化翻译理论核心观点

文化翻译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范式, 其理论建构深刻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实践路径。该理论由苏珊·巴斯奈特与安德烈·勒菲弗尔[7]在《翻译、历史和文化》中系统提出, 其核心观点可概括为三个维度。首先, 文化是翻译的基本单位。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历史和文化》中明确提出, 翻译应以文化作为基本单位, 而非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语篇转换。她以“文化是身体, 语言是心脏”的隐喻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共生关系, 指出“翻译绝非纯粹的语言行为, 而是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翻译观的局限, 要求译者将文化语境视为翻译决策的核心参照系。巴斯奈特进一步阐释, 翻译的功能等值应体现在文化层面, 使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 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的效果与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产生的效果一致。

其次, 文化功能的动态对等。理论提出了“文化功能对等”原则, 要求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与原文相似的文化功能。奈达[8]的“功能对等”理论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标准, 主张译文读者应产生与原文读者“等效的反应”。尤金·奈达[8](Eugene Nida)在《语言、文化与翻译》(1993)中提出, 翻译的目标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 其核心在于实现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在文化体验层面的“等效反应”。这一原则在服饰翻译中体现为对色彩象征、材质隐喻等文化意象的精准传递。奈达强调, 当形式与内容冲突时, 应优先保证内容对等, 必要时可改变形式或采用“重创”技巧。

此外, 译者需要充当文化协调角色。巴斯奈特将译者定位为“文化解释者”, 需在异化与归化策略间寻求平衡。异化策略强调保留文化独特性; 归化策略则通过文化适配提升可读性, 但增强文本流畅性。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 翻译活动受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与赞助人三重因素的制约, 译者的策略选择本质上是文化资本与意识形态博弈的结果。

2.2. 《红楼梦》服饰文化内涵

服饰作为一种直观的文化载体, 能够直接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同时, 《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也是一种符号系统与社会隐喻。

2.2.1. 等级制度的物化载体

清代服饰制度通过《大清会典》确立了严密的等级标识体系, 服饰的色彩、材质、纹样均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的符号。红色作为贵族专属色, 象征权力与尊贵; 明黄色则为皇家垄断, 体现皇权至高性。服饰材质的贵贱直接映射社会地位, 如云锦等顶级织物的使用, 强化了等级的不可逾越性。这种制度性书写不仅再现了清代社会结构, 更通过服饰的符号化, 构建了等级的视觉秩序。

2.2.2. 民族文化与文化记忆的见证

《红楼梦》的服饰描写深刻反映了清代满汉文化的发展历史进程。男性服饰中的“箭袖”“辫子头”体现满族骑射传统，而女性服饰多承袭汉装形制，这种满汉杂糅现象既反映了文化交流，也暗含曹雪芹对文化身份的复杂思考。服饰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其变迁轨迹成为解读清代文化互动的密码。

2.2.3. 人物塑造与审美表达的媒介

曹雪芹以“曹衣出水”的传统绘画风格，通过服饰描写塑造人物性格，传递审美意蕴。服饰的色彩、款式与人物气质形成镜像关系，如王熙凤的“彩绣辉煌”外化其张扬性格，林黛玉的“素白袄儿”映射其清冷气质。服饰的动态描写更强化了这种投射，形成视觉与性格的戏剧性张力。

3. 服饰文化翻译案例分析

3.1. 文化意象的传递性：直译加注与文化传真

杨宪益译本通过直译加注法，最大限度保留服饰文化的还原性。这种直译与注释相结合的策略，使服饰翻译既成为文化专有项的解读传播，又成为目标语文化认知的建构过程。

案例 1:

原文：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红猩猩毡斗篷(第八回)

杨译：He wore a scarlet cloak of astrakhan.

霍译：He was wearing a large scarlet felt cloak.

分析：杨宪益将“猩猩毡”直译为“astrakhan”，“astrakhan”在英语中指的是一种产自俄罗斯等地的羊羔皮，其卷曲的质地与中文“猩猩毡”所指的细密毡毛织物在视觉和触觉上存在一定相似性，此外译文通过语境暗示其材质为羊羔皮，保留了清代服饰中兼具游牧文化与宫廷用料的特征。尽管杨译本未添加显性的注释，但通过“astrakhan”这一词汇的选择，他巧妙地将“猩猩毡”的文化内涵融入译语语境中，实现了文化意象的隐性传递。

其次，杨宪益对“大红”的翻译也体现了文化传真原则。他将“大红”译为“scarlet”，这一色彩词汇在英语文化中同样承载着贵族、尊贵、权力等象征意义。在西方文化语境中，“scarlet”常与宗教权威、贵族阶层以及社会地位相关联，这与中文“大红”在清代服饰制度中所象征的贵族身份和特权地位形成文化功能对等。通过“scarlet”一词的选择，杨宪益不仅传递了贾宝玉服饰的色彩信息，更传递了这一色彩背后的文化意蕴，即贾宝玉作为荣国府嫡孙的尊贵身份和在贾府中的特殊地位。

霍克思选用 felt 精准对应“毡”的织物属性，增补“large”还原斗篷形制，用 scarlet 保持身份象征；全程采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服饰词汇，以归化策略降低认知门槛，可读性优于杨译，但弱化了“猩猩毡”所带的游牧材质文化痕迹。两译本均保留核心文化符号，杨译重文化传真，霍译重语境适配。

案例 2:

原文：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大红洋缎袄(第三回)

杨译：Her dress was of scarlet foreign satin,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read in a design of a hundred butterflies.

霍译：Her dress had a fitted bodice and was made of dark red silk damask with a pattern of flowers and butterflies in raised gold thread.

分析：杨宪益将“洋缎”直译为“foreign satin”，既保留了清代中西贸易的文化背景，又通过“satin”一词唤起英语读者对奢华织物的联想。“缕金百蝶”的直译，则强化了王熙凤张扬奢华的性格特质。将

“百蝶”直译为“a hundred butterflies”，虽牺牲了中文“蝶”与“耨”的谐音吉祥寓意，但通过“butterflies”在英语文化中“蜕变重生”的象征意义，构建了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命运隐喻，形成跨文化阐释的开放性空间，实现王熙凤服饰的文化功能对等。

霍克思将“洋缎”转译为西方熟知的“damask”（锦缎），用“fitted bodice”还原“窄袖”紧身特征，增补“flowers”适配西方审美习惯，以归化重构实现文本流畅；虽简化部分中式纹样信息，但更贴合英语读者服饰认知，以阅读体验优先完成文化功能适配。

3.2. 接受语境的适应性：意译重构与文化适配

面对文化专有项的不可译性，杨宪益译本采用意译重构策略，提升译文的可读性。这种策略选择实现了翻译的文化协调。译者的任务并非单向传递文化标本，而是要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构建跨越认知的中介，使文化意象在异质语境中具有同样的效果。

例 3：林黛玉的“月白绣花小袄”

原文：半旧的月白绣花小袄(第八回)

杨译：her old pale blue embroidered jacket.

霍译：her faded pale blue embroidered tunic.

分析：杨宪益将“月白”意译为“pale blue”，虽牺牲了中文色彩的文化联想，但通过“pale”一词保留了黛玉服饰的淡雅特质，适应了英语读者对色彩的心理认知。

霍克思用“faded”精准对应“半旧”，以“tunic”替代“jacket”，更贴近西方古典女装认知；在色彩忠实基础上强化服饰场景感，进一步降低文化陌生感，与杨译共同实现以功能对等传递人物清冷气质的目标。

例 4：史湘云的“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

原文：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第四十九回)

杨译：She had on a thick fur coat lined with grey squirrel and faced with black marten.

霍译：She was wearing a heavy fur-lined coat with black sable facing.

分析：杨宪益译本针对清代服饰文化专有项“里外发烧”采取了功能导向的意译重构策略，通过拆分原文长句、重组信息，将“thick fur coat”确立为语义核心，成功实现文化意象的跨语境适配。面对“貂鼠脑袋面子”与“黑灰鼠里子”的材质叠用及“里外发烧”的工艺描述，译者不拘泥于字面对等，而是以“保暖功能”为文化传递支点，用“lined with grey squirrel”与“faced with black marten”的材质并置，在目标语语境中重构了贵族服饰的奢华质感。这种策略本质上是文化差异驱动下的适应性调整：当源语细节超出目标语读者认知时，通过功能对等原则，将工艺描述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体验，既规避了“缎地加毛”工艺的阐释，又维系了服饰描写的艺术性与叙事完整性，在文化传真与读者接受之间构建了精妙的平衡。

霍克思以“heavy”突出保暖属性，用“sable”替代“marten”，采用西方更通用的貂皮称谓，完全舍弃中式工艺俗称，以极简归化表达还原华贵皮毛大衣核心信息；与杨译路径一致，均以意译重构实现跨语境适配，霍译更彻底贴合目标语表达习惯。

3.3. 翻译策略的阐释性：文化对等词替换与意义再生

杨宪益译本通过文化对等词替换，在目标语文化中重构服饰的文化意蕴。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文化意象的重构再生，在保留原文文化内核的前提下，主动调整表达形式，使文化意象在目标语文

化中获得新的阐释空间，实现文化意象的跨语境传递与再生。

例 5: 贾母的“凫靛裘”

原文: 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第五十二回)

杨译: It's made of peacock feather thread brought from Russia.

霍译: It's woven from peacock feathers sent as tribute from Russia.

分析: 杨宪益译本通过“peacock feather thread”这一文化对等词的选择, 实现了“凫靛裘”文化意象的跨语际意义再生。“凫靛裘”的本质是清代皇家织造工艺的符号转译。杨宪益将“孔雀毛拈线”直译为“peacock feather thread”, 既保留了服饰材质的珍稀性——以禽羽为线在 18 世纪欧洲同样属于奢侈工艺, 又通过“thread”一词暗示了俄罗斯织造技术的介入, 与原文“俄罗斯国”的产地说明形成互文。这种物质文化解码, 使目标语读者能在自身文化经验中定位这一异域奇珍。此外, “peacock”在英语文化中承载着双重象征: 既代表奢华与异域风情, 又暗含骄矜之义, 使“凫靛裘”在译文中既成为贾母尊贵身份的物化符号, 又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奢华与物质特征, 形成了更丰富的文化阐释空间。

霍克思增“tribute”(贡品), 直接点明皇家专属属性, 强化身份象征; 以“woven”突出织造工艺, 在文化对等基础上主动增补权力内涵, 使西方读者快速理解其珍稀与尊贵; 与杨译相比, 霍译以意义增补拓展阐释空间, 更强调文化符号的社会功能。

4. 文化翻译理论启示与实践建议

文化翻译理论为《红楼梦》服饰文化外译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与实践路径。该理论揭示, 翻译的本质是文化意象的跨语际传递, 需在文化忠实与读者接受间构建动态平衡。杨宪益, 霍克思译本通过多种方法实现文化意象的功能再生, 印证了“文化作为翻译基本单位”的核心命题。这一实践表明, 译者需兼具文化解释者与协调人的双重角色, 既要通过符号学翻译模型解析色彩、材质、纹样的文化密码, 又需在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念制约下, 灵活多种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 [1]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 [2] Cao, X.Q. (1978)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Yang Xianyi, Dai Neidie, Trans.,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3] Hawkes, D. (1973-1980) *The Story of the Stone*. Penguin Books.
- [4] 季学源. 红楼梦服饰鉴赏[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 [5] 缪丽伟. 和合翻译理论视域下的《红楼梦》传统服饰文本翻译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21.
- [6] 张慧琴, 徐珺. 《红楼梦》服饰文化英译策略探索[J]. 中国翻译, 2014, 35(2): 111-115.
- [7] 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Burns & Oates.
- [8] Nida, E.A. (1998)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3, 30-34.